2020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

作为此次大会承办地，福州立足古厝特色，以“世遗大会”为契机，推动城市品质提升。

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是清朝乾隆年间闽清古县城的主要区域，街巷仍然保留有民国时期“五街九巷、四市一铺”的城市格局。（图片来源：福州晚报）

2020年世界遗产大会衍生积极效应

古厝特色成为“福州元素”

邓啸林 周耿汴

15条历史街区开街 福州打造古厝品牌

书院巍巍，古榕掩翠；状元古道，名人辈出；市民徜徉其间，如在画中游，如在史中醉……一条小小的街区，就聚集着鳌峰书院、全闽师范学堂、格致中学等诸多知名学府，这正是刚刚亮相的福州鳌峰坊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所呈现的景象。

为筹备2020年“世遗大会”，福州每个区县至少出现了一条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并以“绣花”功夫凸显古城记忆。2020年1月21日，包括鳌峰坊、南公园、烟台山、梁厝、船政、昙石山、水西林等在内的15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集体向市民亮相，而这只是福州借筹备世遗大会良机推动古厝保护的一个侧面。

在福建方言中，“厝”代指人居住的场所。作为一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城在山中、山在海中”。古厝是福州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三坊七巷、宏琳厝、三落厝等诸多古厝使得福州保存着相对完整和原生态的古城格局。

2020年世界遗产大会将在中国福州举办。当地已经将文化遗产影响力与城市发展机遇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举办2004年的‘世遗大会’，苏州就在世界范围内叫响了‘园林’品牌。借助2020年‘世遗大会’契机，福州可以更突出一点本地元素。推出‘古厝’品牌。”当地一位文化传承研究者这样认为。

福州始终坚定不移抓好文物保护工作，对古厝保护投入力度很大。开始筹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后，福州先后举办“福州古厝保护与文化传承论坛”，又颁布了《福州市新一轮古厝保护提升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公布一批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启动实施一批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工程，精心组织一批主题展，完成一批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预备一批申遗项目等“六个一批”任务。

《方案》重点关注了福州三山两塔、鼓山鼓岭、福建船政建筑群和工业遗产、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朱紫坊等处标志性建筑和古厝。但对于福州而言，古厝所涵盖的范围更广。在福清市的乡间，就有密集分布的郎官村、侨丰村、联华村的黄家老厝、林家大院、郭氏祖屋等古厝。这些古厝虽饱经沧桑，但依然屹立；也依然身为瑰宝但少为人知。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古厝主人多为华人、华侨，已定居海外多年，如作为林家大院主人之一的林元干、林元开现为印尼华侨。相较那些已经为游人熟悉的、标志性建筑和古厝，这些大院所蕴含的建筑、宗族、移民文化等元素，依旧应该得到重视。

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是按照“福州艺术门户”“都市最美村落”定位打造的田园风格古村落街区。

留住古厝的根与魂 注重内涵挖掘和传承

“现在古厝保护的硬件水平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内涵的挖掘还有待加强！”针对福州古厝的保护与开发，卢美松有着很多心得体会。作为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他长期致力于福州地方史的研究。

在卢美松看来，当地有些古厝街区虽然商业开发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实际上很多古厝的利用率并不高。他以三坊七巷为例分析得出结论，除了水榭戏台、二梅书屋、叶氏故居、林则徐纪念馆被开辟为民俗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禁毒教育示范基地外，还有许多古厝建筑或空置，或因收费而参观人数稀少。于是他就有了一个“激进”的想法：建议福州应参照杭州“西湖还湖于民”的做法，在具备保护能力的前提下，将159处文物建筑让机构和个人去认领，展示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家族历史。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扩展为挖掘不同类型古厝背后的文化，比如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永泰庄寨所代表的坊巷史话、商贸史话、园庐史话、庄寨史话等。卢美松认为：“古厝保护也需注重非遗传承，如文儒坊闽山巷里有个卓公祠，其举办的闽山庙会展现出丰富的福州非遗元素，建议抓紧抢救。”

同三坊七巷文化一样，福建船政文化也是福州的文化名片。在著名船政史和海军史研究专家陈悦眼中，船政文化建筑群和工业遗产也应该进行完整而系统的保护。他认为：“福建船政在中国近代海防、近代航空、近代教育、近代工业、近代外交、近代翻译等领域皆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具备多项‘第一’。福建船政不仅应该先申请工业遗产，也应该研究进一步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途径。”

福州市民陈初越从事了数十年的文字编辑工作，但他也一直致力于挖掘福州古厝的文化内涵。刘家大院是三坊七巷内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厝建筑，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林则徐的大女婿刘齐衔、福州首富“电光刘”、一代文豪郁达夫都曾在此留下印记。陈初越和朋友们将这里打造成三坊七巷名人家风家训馆，还创立了“郁达夫的下午茶”这一文化品牌。“我提议在‘世遗大会’到来之前，‘点亮福州一百座古厝’，在古厝广泛举办各式各样的诗歌与民俗交流活动，再进一步成立国际化的诗歌艺术交流中心。”陈初越说。

在闽江及其支流上，都存在着大量的古厝。如琴江满族村、闽安古镇、林浦村、潘墩村、螺洲古镇、嵩口古镇、月洲村等。林浦村的“泰山行宫”、月洲村的“一尚书一状元五十进士”、林浦村的“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大埕村“九条金带”等，都蕴含着丰富的科举、宗族文化。这些传统村镇和古厝的类型和内涵都有相似之处，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开发和利用力度仍普遍不够，一些历史记忆有湮灭的危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旧城改造规模不断扩大，大批量的、偏远地区的传统村镇和古厝必然会面临如何保护的考验。为更好发挥福州近年来引进的年轻人才作用，福州市委组织部成立了榕博汇智库，下设历史文化旅游专委会等多个专委会。黄晗微现任福州招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在古厝保护方面，她既是亲历者又是参与者，也是榕博汇智库成员。“依托榕博汇智库这一平台，我参与了对晋安北峰山区的调研，对当地的古厝等文旅资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摸底，以期在世遗大会到来之前，提升该区域全域旅游的水平。”

同时，黄晗微还积极参与到由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引进生发起的“福州船政文化口述历史计划”，除船政文化，还对君竹村、金砂村、白云村等传统村镇的古厝及相关人士进行口述历史访谈，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介形式，来抢救福州古厝的历史记忆。

福州古厝的未来 成为文化遗产的“热词”

“福州的古厝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虽然很多，但是世界遗产和5A级景区比较少——我们福州人相对低调，这些资源尚未完全转化为经济效能。”福建任氏宗亲会会长任义国曾到过福建很多地方。对福州古厝保护与利用的情况，他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

根据福州当地的相关研究数据可以看出：2018年国内游客对5A级景区三坊七巷的知晓度仅为59.9%，远不及同为5A级景区的武夷山（83.6%）、厦门鼓浪屿（82.3%）。2018年中国旅游城市排行榜中，福州仅排名39，且一日游、国内游的比较多，过夜游和国际旅客比较少。这些数字也带动了政府和当地民众，希望以世遗大会为契机，在文化遗产的公众传播上多下功夫。

与世界遗产大会契机重合，福州目前也正在大力推进幸福产业发展，这同样为古厝保护与开发提供了良机。幸福产业涵盖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领域。福州发展幸福产业的资源禀赋可谓是得天独厚。福州的森林覆盖率和空气质量指数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福州的会展、体育、网游等产业基础较好，闽菜、闽剧、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悠久，古厝民居星罗棋布。刘昕彤是福州市文投集团副总经理，亲身经历了当地鼓岭地区将古厝等文化资源与幸福产业共同发展的过程：“鼓岭拥有一批文物和历史建筑，如宜夏别墅、万国公益社、夏季邮局、李世甲故居等，在广义上都属于古厝的范畴。鼓岭借助福州筹备‘世遗大会’以及新一轮古厝保护的机遇，大力发展幸福产业，立足鼓岭所独有的建筑文化、休闲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海外文化，对历史建筑进行活化利用，发展森林康养、宗教朝圣、文化产业、温泉养生等旅游产品，推动鼓岭-鼓山联合申遗，并与贵安、桂湖等地的温泉休闲产业形成联动，目前已经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与苏州园林、永定土楼相比，“福州古厝”尚属一个新晋热词。随着一座座古厝的保护、开发、改造、提升和世遗大会的召开，这一文化现象是否会进一步发生改变呢？

在永泰宁远庄，当地专家学者正在筹建中国古兵器博物馆。庄寨作为一种建筑式样，是土楼、土堡之外，福建又一建筑艺术瑰宝，多为富裕人家所建，外设石墙，有防卫功能。

邓啸林 摄

看·世界遗产

图为山上碑。

在日本高崎市区外的乡野山间，伫立着山上碑、多胡碑、金井泽碑，依次刻立于公元681年、711年、726年。在东瀛列岛屈指可数的早期石刻中，这3通石碑都有明确的刻立年代，文字保存尚好，因而均被日本政府列为“特别史迹”。加之彼此相邻，全部坐落于古称“上野国”的群马县境内，故又合称为“上野三碑”，是汉字文明圈极东一隅难得的代表性遗存。

寻访上野三碑 感悟记忆遗产

乔鲁京 文/图

从东京最繁华的中心城区乘火车出发，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就可以抵达群马县境内的小城高崎。群马县经济尚可，但可能是偏居东京都市圈西北边缘的原因，让它在日本四十七个都道府县里显得存在感很低。我之所以选择来群马旅行，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参观“富冈制丝厂和丝绸产业遗产群”，2014年这个项目被列为世界遗产，因为比“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早列入一天，所以日本媒体当时将其称做“全球第一项和丝绸有关的世界遗产”。

另一个目的是寻访三通石碑。

2019年初，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完《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后，于暮色中直奔高崎。从火车站台步入高崎站大厅，第一眼就看见在最显要的位置安放着上野三碑的模型。原来在2017年岁末，上野三碑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于群马县来说，这是继富冈制丝厂后获得的又一项殊荣，宣传推广自然少不了。

明明是3通石碑，怎么会成为文献类遗产？带着疑问，第二天我开始了寻访之旅。遵循高崎火车站里详细的导览说明，我乘坐上信电铁来到吉井站。这座小小的迷你车站是上野三碑周游线路的起点，当地安排免费的中巴车循环于车站和各通石碑的所在地点，每日八趟周而复始。离开吉井站后的第一站是多胡碑。这通规整的石碑保存在碑亭内，游客可以自助开灯，隔着栅栏仔细观看。多胡碑附近还建有一座小型博物馆，让我惊讶的是其中竟然展陈着北京居庸关云台元代六种石刻文字的整幅拓片。

之后寻访的山上碑、金井泽碑都位于青山翠谷中的高敞台地上。和多胡碑一样，也都在原址加盖了遮风避雨的保护碑亭。可喜的是碑亭都不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均留出门窗空隙，供参观者一睹石碑真容。更贴心的是每座碑亭门旁设置的自助电灯开关，让游客虽然隔着门窗，仍能看得真切。

前一日我刚刚看过《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再看上野三碑上的汉字，坦率说其间水平高低的反差还是很强烈的。又从形制看，山上碑仿佛缩小的好大王碑，略有石碑外貌而已。至于金井泽碑，称之为在一块浑圆石头上的题刻似乎更为妥当。既然书写粗鄙、形制简陋，可为何它们还能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关键在于内容。上野三碑虽然字数不多，但记载了距今1300多年前从朝鲜半岛迁徙来的“渡来人”情况，以及当时日本从中国取法的政治制度、引入的佛教文化等宝贵信息。这些留存在顽石上的文字内容，符合世界记忆工程对于文献遗产“包括任何介质”的定义。

如果从中国的文物保护分类观察上野三碑这样的遗产，应该属于不可移动文物里的田野石刻文物，故而上野三碑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借鉴。在中国，类似具有档案文献性质的石刻文物还有很多，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西安碑林等还曾被列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候选项目。如果从档案文献的角度梳理其价值，与上野三碑相比，至少各有千秋。在申遗越来越难、国内竞争越发激烈的大背景下，各地不妨把思路转向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尽管存在体制机制上的一些困难，但至少有上野三碑的成功先例在前，未尝不是更具可行性的操作方向。

寻访上野三碑后，乘坐上信电铁的小火车返回高崎。小小的车厢里贴满了当地中小学生创作的家乡风物绘画作品。我注意到上野三碑是许多孩子倾力表现的对象。通过国际组织认证遗产的价值，激发当地民众的自豪感，让遗产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我想这节车厢才是我此行看到的最美丽的风景吧。

世界记忆名录——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旨在提高人们对档案文献遗产重要性和保管必要性的认识，并由此设立了世界记忆名录，选取收入各国珍贵文献遗产作为人类共同保护的记忆。

经过多年发展，世界记忆名录和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遗产保护领域的三大品牌项目。和上野三碑同在2017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还有中国提交的“甲骨文”和“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以及中国和葡萄牙共同提交的“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年至1886年）”等项目。

上信电铁车厢内，挂满当地中小学生创作的与上野三碑相关的绘画作品。